文化资本和家长参与：自主招考的城乡烙印

作者：易全勇

来源《全球教育展望》2020年第3期

摘要

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已经从过去的能否上大学转移到现在的上什么样的大学。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家庭背景与学生学业成就之间的相关分析上，较少关注家长是通过何种机制将这些优势传递给后代，尤其是在自主招生过程中，城乡家庭面临哪些结构性约束，他们分别又是如何应对这些约束的。本文通过对江西省三个家庭（分别是农民、外出务工、市民家庭）进行的为期7个月的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挖掘他们背后的家长参与逻辑和内心世界，运用深描手法展现了城镇化在他们身上的特殊烙印。研究发现这三种家庭的家长在参与子女自主招生过程中存在显著差异。透过文化资本理论和家长参与理论两条轴线，本文尝试用阶级与城乡的交叉性影响来分析不同家庭在子女高考升学过程中的城乡差异及其家庭优势传递路径。

关键词

父母参与；自主招生；文化资本；城乡差异

**研究背景**

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二元结构作为我国的基本现实，在社会发展和阶层分化中发挥了显著的结构性作用。虽然我国政府致力于破除城乡壁垒，努力建设城乡一体化格局，但长期的二元分割导致农村在诸多方面落后于城市的状态不是在短时期内可以消除的，尤其是在一些隐性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福利层面。教育发展的城乡差异正是诸多社会矛盾中最突出、最受百姓关注的矛盾之一。［1］

教育发展的城乡差异集中体现在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而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在高等教育入学这个节点上已经从过去的能否上大学转移到现在的上什么样的大学。虽然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从1998年的9.76％增长到2016年的42.7％，早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但是诸多实证研究表明，**来自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子女有更多机会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来自高学历、大城市、高收入和从事优势职业者家庭的子女占有更多优质高等教育机会。**陈晓宇、谢作栩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农民、工人、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在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方面都处于显著劣势，农村生源离重点大学越来越远成为不争的事实。［2][3][4］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说，李春玲等学者发现，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和“有效维持不平等”的现象均成立。［5][6］近年来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比如基础教育领域的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两免一补，以及高等教育领域的高等教育扩招、增加大学生奖助学金数额、面向农村学生的专项招生计划等，使得农村学生进入大学的比例有所回升，也为促进教育公平提供了良好契机，但是相关实证研究表明，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并没有明显下降，只是变得更加隐蔽而已。［7][8][9][10][11］现有文献一方面在为城乡教育机会分配不均继续提供佐证，另一方面也在寻找和挖掘这些隐蔽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但是，大多数文献主要集中在探讨家庭背景与学生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并且集中归因到城乡二元结构、教育制度和家庭背景等因素，较少关注这些因素是通过何种方式发挥作用，对在社会最小基本单位的家庭中家长是通过何种机制将这些优势传递给后代的研究更是匮乏。



**理论视角**

教育机会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问题一直是教育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之一，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城乡差异也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作为分析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重要视角之一的文化资本理论缘起于对社会正义问题的审视。**在本文中我们所讲的社会正义仅限于对教育领域的实质正义的讨论，其中影响最大的学术流派莫过于罗尔斯（J. Rawls）的分配正义论。**基于亚里士多德“对相同者给予均等对待，对不同者给予不均等对待就是公平”的观念，罗尔斯提出了分配正义理论。他认为社会可以不均等，但是一定要尽力做到公平。个人自然禀赋和社会阶级地位不应该影响每个人在社会分配中的利益，公民个人不应该为这些任意偶然的差异导致的结果埋单。［12］但是，**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是在一个假想的社会格局和道德主体之下提出的，它也仅限于对社会产品的分配事实，而没有质疑导致道德主体处于不利地位的原因。针对个体处于不利地位的原因分析主要有两种范式**：基于自致性（Achieved）因素的贤能主义模式（机会平等）和基于先赋性（Ascribed）因素的社会再生产模式（机会不平等）。

不考虑先赋性因素的影响，纯粹通过自己努力取得成功是一种理想化的竞争模式。然而，社会生活总是纷繁复杂的，每个人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事实上，自从科尔曼（Coleman）等人于1966年发表著名的《教育机会均等报告》（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以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就在学界引起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而基于先赋性因素的社会再生产模式在分析教育机会不平等方面更有解释力。先赋性因素作为一种稳定的关系模式或者结构性力量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区分。清华大学刘精明以家庭为单位和范畴，把先赋性因素划分为家庭资源和非家庭的先赋条件。［13］家庭资源作为一种总体性的阶级地位和境遇，又可以划分为内生性资源和外依性资源。内生性资源主要是指整个家庭的人口结构状况以及内化于家庭成员之中的知性与情感体系，比如家庭文化资本。而外依性资源主要是指根源于外部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非家庭的先赋条件主要包括因城/乡，贫困/非贫困地区，学区/非学区，以及其他重要的制度性区隔产生的约束性条件。刘精明的划分方式有助于厘清家庭资源的类型，但是这三种资源之间存在重叠部分，在具体的研究操作过程中容易产生混淆。德沃金（R. Dworkin）则根据资源的来源和属性把先赋性因素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对自然馈赠的不平等获得，即个人资源，比如性别、健康、天赋等；另外一种是对社会、经济馈赠的不平等获得，即非个人资源，比如种族、语言、所在社区、所处社会经济地位等。［14］

在厘清了先赋性因素的种类之后，社会再生产理论面临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这些先赋性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并导致教育机会分配不均的？通常来讲，主要有个体能动性调适路径和群体结构性支配路径两种模式。也就是梅耶（John Meyer）在《教育社会学理论中的解释范式》一文中提出的弱再生产和强再生产模式。强再生产模式主要关注国家教育政策、宏观权力结构关系的调整是如何通过学校教育系统实现社会再生产，从而巩固既得利益者的地位，代表人物如鲍尔斯（S.Bowles）和金梯斯（H. Gintis）、阿普尔（M. Apple）以及葛兰西（Gramsci）等。

与强再生产模式强调学校教育过程对原有社会阶级结构的重新复制不同，弱再生产模式则从更微观的角度关注家庭优势的传递，考查的重心也从学校转移到家庭。比如，著名社会语言学家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儿童在语言表达和抽象思维能力上存在巨大差异。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所使用的语言具有系统性、逻辑性、文学性、修养性的特征，伯恩斯坦称之为精致型编码（elaborated code）。而劳工阶级家庭的孩子所使用的语言则加具体化、生活化、共同性和通俗性，伯恩斯坦称之为限制型编码（restricted code）。［15］他通过进一步观察发现，不同阶层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相差悬殊的根源在于家庭，家庭内部的对话形式和内容都直接影响儿童语言编码能力的养成。

但是，任何家庭成员都不是社会结构压力下的木偶，而是会根据自身境遇和身份地位对自己日常生活中某些社会行动的意义进行反思的个体。同时，任何家庭都不是一座孤岛，也不是社会中独立的绝缘体，而是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实质载体，家庭的资源深受所处社会结构的影响，更何况“培养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社区）的共同努力”。因此，**在强调宏观社会结构力量的强再生产理论和强调微观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弱再生产理论之间是不是有内在的相关性？布迪厄（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及其后继者尝试在二者之间搭建一座桥梁，并试图开辟第三条道路来揭示社会不平等。**

为了试图超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二元对立，布迪厄［16］[17]提出了基于文化资本的反思实践理论，并且通过资本（capital）、场域（field）、生存心态（habitus）以及实践（practice）等概念建构出一个揭示社会不平等的实践理性大纲。他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区分了四种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其中经济资本是一切资本的根本，但是不能仅仅依靠经济资本独立统治和维持社会运转，唯有利用象征力量，才能将权力和规则合法化，从而让统治习焉不察，而这个过程中，文化资本是最有效的方式。文化资本既包括有教育意义的实物，比如教材，教具，乐器等，也包括能实现教育意义的能力，比如知识储备、语言技能、审美品位等，更包括在社会机构中获取的教育文凭和资格证书等。文化资本的积累基于经济资本，始于儿童时代，贯穿于父母的言传身教。布迪厄也指出场域并不是一个物理空间，而是一个各种力量不断角力的客观关系结构。场域中有基本法则和规则，场域的原动力存在于其结构的形式之中，尤其是存在于彼此冲突的各种各样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差距和不对称之中。生存心态并不是命运，也不是人们强加于社会个体的“天数”，而是一种不断受经验控制和调试的开放的意向系统。生存心态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决策系统，社会结构造就了生存心态，反之，生存心态也在不断改变社会结构。很多时候，社会行动者个人对自己的生存心态没有感知，而是以一种习惯和随波逐流的形式存在。布迪厄认为外在结构的社会关系和个体的内在倾向间存在一个互构的过程。一方面，外在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个体能动性的运作条件，并且特定群体的生存心态也是对外在权力结构和资源结构的一种反映；另一方面，个体的内在倾向不断与外在结构循环互动，在一定的场域和范围之内，把现有结构化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s）生成新的新的社会结构（structuringstructures），只不过大部分时候这种生成的结果只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而已，而整个阶层优势及文化传递过程的最主要载体就是家庭。

家庭是教育的第一场所，父母在子女的教育过程中尤其是升学阶段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西方学者对家长在教育不平等尤其是高等教育入学方面已有较多研究。虽然家长参与这一概念在西方研究中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已经被广泛使用。美国家长教师协会把家长参与定义为家长对子女从出生至成年期间所有关于子女教育及其发展的活动的参与。美国家长参与联合会更进一步把家长参与定义为家长在子女专业学习和其他学校活动中常规的、双边的、有意义的交流。何瑞珠（Sui-Chu Ho）和威尔姆斯（Willms）根据参与的地点把家长参与归纳为家庭为主、学校为主和社区为主三种参与类型。［18］爱泼斯坦(Epstein)基于“交叠影响域”（Overlapping Spheres of Influence）理论指出，家庭、学校和社区对儿童发生了交互叠加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参与行为划分为六个维度：养育子女（Parenting）、相互交流（Communicating）、志愿服务（Volunteering）、在家学习（Learning at home）、参与决策（Decision making）、与社区合作（Collaborating withcommunity）［19］。何瑞珠和爱泼斯坦的家长参与框架为教育实践者和家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和指南，但是里面没有指出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在家长参与方面存在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是如何影响子女学业成就和人生轨迹的。

美国学者科恩（Melvin Kohn）发现，父母的职业状况对父母的教养观念和参与方式有重要影响。来自底层劳工阶层的父母往往强调对权威的服从，而来自社会中产阶层职业的父母则更倾向于重视个人的自主性。［20］著名教育人类学家拉鲁（Annette Lareau）通过对12个美国家庭15年的跟踪调查也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父母在家长参与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家庭优势》和《不平等的童年》两本书中，拉鲁指出处于社会底层如劳工阶层和黑人家庭的父母更倾向于采取一种让孩子自然成长的教养方式（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21][22］来自这些家庭的小孩一般与离家不远的亲戚朋友的小孩一起在街道闲逛玩耍。父母一般采用直接命令式语句跟子女交流，子女也较少质疑父母的决定。由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这些家长天生与学校存在一种距离感，学校和家庭中的子女教养方式也有所冲突，进而让孩子在与他人和社会机构互动时产生一种局促感（sense of constraint），让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利地位。相反，白人家庭和中产阶层家庭的父母大多采取一种精心栽培模式（concerted cultivation）。他们通过精心安排、协作规划各种日常休闲学习活动，激发子女的潜能，养成好的习惯，培养社会所需的技巧。来自这些家庭的父母往往用一种商量和讨论的语气与子女交流，允许子女对成人的观念和行为进行反驳。同时，由于这些家长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因而家长们能有效地跟社会机构如学校进行沟通和干预，从而为子女争取资源和权益。在这些干预过程中，子女也习得了父母的一些社会技巧，同时也逐渐养成了一种优越感（a sense of entitlement），让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擅于捍卫自己的权利与利益，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进而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有利地位。

西方国家的家长参与维度与逻辑及其自身的社会母体结构和价值观念息息相关，而在城乡呈现多元化和儒家文化主导下的中国，**不同类型的家长是通过哪些机制和方式实现阶层优势和家庭优势的传递呢？不同类型的家长在参与子女大学自主招生选拔过程时面临哪些结构性约束，又是如何应对这些约束，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基于现有文献，本文试图沿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及家长参与理论的框架分析不同社会阶层的家长在参与子女大学自主招生选拔过程中存在的差异，从而考查不同家长如何把家庭优势传递给子女。

**研究设计**

**基于研究问题，本研究设计以质化取向的个案研究展开。具体的田野工作从鸿鹄中学（化名）2015年高三上学期的家长会开始，通过非正式访谈了解一些学生和家长的家庭背景信息，初步锁定了一些目标家庭。**基于研究问题的需要，本研究最终确定了三个家庭（分别是陈小生、彭欣欣和李城睿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家庭信息如表1所示）。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所有家长、学生以及学校名称均用化名表示。

本研究中的三个家庭均来自江西省宜春市。宜春市地处赣西，2016年户籍人口有602万，其中城镇人口257万，全市产业结构比例为14.0∶50.9∶35.1，基本上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据江西省统计数据显示，江西省平均每2.05户就有一个劳动力外出打工，其中宜春市2014年外出务工人口超过100万。外出务工分常年外出务工和季节性外出务工两种。常年外出务工的人口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福建、海南等沿海城市。近年来随着国家返乡创业政策和城镇化的拉动作用，很多常年外出务工人员呈现回流趋势。季节性外出务工人员主要从事建筑、货运、海产品加工等行业。他们农闲时外出，农忙时返乡。根据宜春市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该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745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643元。另外，根据宜春市教育局公布的数据，该市2016年共有普通高中39所，在校生112451人，其中高考考生42760人。作为本文田野调查点的鸿鹄中学系该市一所省级示范性高中，该校有在校学生3800余人，共有教学班64个。本研究的三个个案均来自鸿鹄中学。

**本研究的个案之一陈小生来自距离宜春市区50公里外的偏远山区。**父母均在家务农，农闲时父亲也会跟着亲戚（一般是包工头，200元/天）去做小工（建筑工人，100元/天）。家里主要收入来源就靠父亲偶尔去做小工挣一点钱，但是最近找他干活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一方面是因为父亲年迈，加上长期从事体力劳动导致的腰腿疼痛，经常需要在家休养；另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农村人都开始去城里买房子，在农村盖房子的人越来越少了。陈小生的哥哥初中毕业后就去外地打工了，据陈小生父母描述，哥哥在外地也没有固定工作，从厨房配菜师、电子厂质检员到摆地摊，什么都干过，但是基本上只能养活他自己，没有余钱往家里寄。陈小生的亲戚中也几乎没有大学生，只有一个堂哥大专毕业。最让父母引以为豪的是小儿子陈小生，作为家里最有出息的孩子，他在学校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且考入了现在的鸿鹄中学重点班。陈小生性格内向，平时不太喜欢跟同学聊天，课后经常坐在座位上埋头做题，笔者看到他的很多课本封皮上都写着“天道酬勤”四个大字。在高三那个春节期间，陈小生在网络空间里写了这样一句话：**“十年前，别人根据你父母的能力对待你；十年后的现在，别人会根据你的能力对待你父母；再过十年，别人会根据你的能力对待你的孩子！”**然后还发了一个奋斗的表情。

表1  受访者信息表



**本研究的个案之二彭欣欣也是来自距离宜春市区30公里外的偏远山区。**其父母均是初中毕业，母亲在家务农的同时还养鱼，父亲在城里开货车，偶尔也会回乡下。彭欣欣兄弟姐们共5人，她有3个姐姐和1个弟弟，因为计划生育超标，父母还被罚了60000元。大姐中专毕业后在广州做导游，二姐从一个一本学校毕业后也在广州某公司当文秘，三姐还在省内一所大专院校就读，弟弟还在读小学。虽然家庭收入比较可观，但是因为仍有三个小孩在读书，父母觉得经济压力还是很大。彭欣欣父亲不满现在的经济状况，并且觉得在农村从业环境不好，于是就来城里开货车了。笔者在后来的访谈中了解到，彭欣欣母亲前年养的鱼被人投毒了一次，导致当年损失十几万。彭欣欣是一个性格外向，善于和同学交流的女生。她的成绩在班上也一直名列前茅，家里客厅的墙壁上挂满了奖状，其中她获得的奖状最多，比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优秀大队干部等。虽然彭欣欣是住校生，但是她周末经常去离学校步行10分钟左右的姑姑家里。一方面姑姑周末会给她做好吃的，改善营养；另一方面是因为彭欣欣父亲经常会在姑姑家里和她见面，顺便看望在姑姑家生活的奶奶（子女每年轮流赡养）。

**本研究的个案之三李城睿是一个走读生，家就住在宜春市区北郊公务员小区，离学校大概10公里。**为了方便照顾女儿，同时降低从家往返学校的时间成本，从高三开始，李城睿的父母通过学校老师介绍在鸿鹄中学校园里面（教师生活区）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进行陪读。李城睿的母亲高中毕业，是一名基层公务员，父亲大学毕业，在国企工作。作为一名基层公务员，李城睿的母亲虽然工作繁忙，但是每天还是会挤出时间给女儿准备丰盛的膳食，甚至经常傍晚还会散步到教学区域与班主任和任课教师交流。虽然父亲经常不在家，但是当李城睿在学业上遇到挫折时，父亲总是会抽出时间帮助分析原因并一起规划学习计划。李城睿的父母很少担心女儿考不上大学，他们更希望女儿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选择理想的专业。作为独生女儿，李城睿一直就是家庭的重心所在。从小打大，父母为其报过的各类课外兴趣班不计其数，包括作文、二胡、吉他、舞蹈、乒乓球、游泳、轮滑等。其中，李城睿最喜欢的就是作文和二胡，她的网名就是“二胡悠悠”。

根据霍思乐（Hossler）等人［23］的大学入学选择模型，结合中国高三阶段的实际情况，本研究的数据收集过程分两轮进行，第一轮在高考前的准备阶段（2015年12月初至2016年5月初），第二轮在高考当天及后期填报志愿阶段（2016年6月初至7月下旬）。收集资料的方法主要有开放式访谈和非正式访谈、参与式观察以及实物收集等。开放式访谈主要是通过与家长进行预约展开，地点由家长选择。有的访谈在学校进行，有的在校外如肯德基餐厅、咖啡厅以及公园等处进行。家访也是本文重要的资料收集方式之一，但是家访很少采取录音的方式，一方面是有些家长不允许，另一方面是有的家长会因为录音的缘故而影响谈话内容以及产生紧张情绪。因此，笔者都是在家访之后的回程中先用录音笔做一个田野笔记，记录关键信息以及自己的反思，之后再通过事后笔录整理访谈内容。通过在自然情境下进行的这些非正式的访谈，笔者收获了非常丰富的信息。另外，对班主任老师和学生的访谈也是重要的资料收集来源之一，同时也是为了实现资料的三角互证。

参与式观察主要在学校日常活动如家长会、文体活动、家长接送子女时以及在学生家访中进行。观察内容包括亲子互动、家长与教师互动过程中的言谈举止以及衣着打扮等。实物搜集主要包括学校相关政策、活动安排、黑板报墙报、横幅标语、学生档案，学生公开的博客日记以及班级网络平台内容等。

质性研究的优势在于可以深入受访者的内心世界，挖掘隐藏在日常生活行为背后的逻辑，但是往往也会涉及伦理问题。例如，笔者刚开始进入田野时经常去教室门口与前来送饭或者探视学生的家长聊天以便寻找目的性家庭，后来在访谈中有住校生（来自农村）说：**“易老师偏心，只关心城里的学生，只跟城市家长聊天。”**通过这次访谈笔者才意识到，经常来学校接送孩子、送饭或与教师交流的家长往往都来自城市家庭。在那次访谈之后，笔者特意跟住校生多做了一些交流，如偶尔一起去食堂甚至去学生宿舍吃饭，从而减少他们的排斥感。在课余时间，笔者还经常跟学生一起参与体育锻炼，比如打乒乓球等，通过这些方式建立与被访谈者的信任感。多次交流之后，笔者与学生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学生们在体育课上还出现主动给笔者买饮料之类的行为，当然，笔者也在适当的场合（如一起打球时）买矿泉水回馈他们。另外，在与家长建立了良好关系之后，有些家长就会跟笔者咨询和求助。为了降低研究者的干预效应，笔者大多数时候都建议他们直接与任课教师或者班主任进行交流。



**三个家庭的自主招生考学之路**

高考升学对中国学生来说是一个综合能力的大比拼，不仅需要花时间和金钱，更需要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不仅需要学生努力读书备考，更需要家长齐心协力，自主招生过程更是完全显示了文化资本的作用。［24］[25]**自主招生作为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应试教育“一考定终身”的缺陷，挖掘具有学科特长和潜在创新能力的拔尖学生。但是，这项政策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公平和效率的矛盾，从而备受社会诟病。**本文中的农民家庭学生（陈小生）虽然参加了农村学生单独招生专项计划，但是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外出务工家庭学生（彭欣欣）也参加了农村学生单独招生专项计划并最终取得成功；城市家庭学生（李城睿）参加了自主招生计划，最终被理想学校录取。从最终结果看，虽然差异不是非常显著，但是从自我评估到申请材料准备及面试的过程却是相差甚大。

**(一) 陈小生：“当了一次炮灰，瞎折腾了一场，只能认命了！”**

陈小生在其个人成长档案“我的大学梦”一栏中这样写道：**“我的梦想是考上上海交大，有一天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地理学家。在小学和初中时，虽然没有接触太多的地理学知识，也没有出过远门，但是我在课外时间努力积累，经常查阅字典和翻看地图，所以我的地理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作为经常名列全年级前十名的陈小生来说，成绩是他获得自主招生资格唯一的敲门砖。但是，即使成绩优异，他在报名自主招生时还是显得非常不自信。如果说学业成绩可以靠天道酬勤来提高，但是准备复试材料以及如何在面试中脱颖而出则很大程度上是需要家庭的支持和训练的。在班主任的多次鼓励下，他鼓足了勇气报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农村学生单独招生计划。

**“我们之前都没听说过这个计划，以为自主招生都是针对特长生的。我现在报这个主要是怕影响高考复习，另外就是我父母都是种地的，也不知道怎么去准备这些材料。”**对于陈小生来说，能通过自主招生选拔考试的都是城市里多才多艺的学生。在班主任通知这一政策时，陈小生显得非常不自信和准备不足。**“自荐信怎么写？去哪里复印和扫描？怎么在网上上传材料？”**陈小生带着这些问题向他的同学和老师求助，因为他知道父母面对这些问题时也不能给予他有效的指导。但是，班上的同学都在忙于高考复习，老师也不可能手把手去教他准备所有的材料，最终他还是只有依靠他自己。

尽管如此，他还是给在农村务农的父母打了一个电话告知他准备参加这次自主招生选拔考试。他的父母在接到电话后更是显得无所适从，在访谈中他父亲这样说道：**“这个消息有点突然，我们也不知道找谁去弄这些材料，只能打电话给他班主任，但是班主任又只会说普通话，我们说不好。打电话给儿子吧，他白天在教室不带手机，只有等晚自习后才能打给他。同时我们又怕耽误他学习，感觉我们什么都不会，净拖后腿。”**陈小生父亲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显得有些自责。在面对国家的这种政策性文本时，来自农村底层的家长显得束手无策，从而会产生一种无力感。一方面，阅读和理解政策文本并明白其要求对受教育程度很低的家长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另一方面，准备政策文本中所要求提供的各种证明材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是，他们没有质疑这个政策本身包含的语言暴力，对他们来说，这种机会已经是一种恩赐，如果没有抓住机会只能怪自己能力不足。此外，从陈小生父亲因为不会说普通话而不习惯与班主任交流来看，语言也是横亘在农村底层父母和城市中产教师之间的一道障碍。陈小生父亲在与笔者的交谈中也多次提到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他们来说，跟学校教师和乡镇府的官员打交道时需要极大的勇气。

在得不到父母和老师有效指导的情况下，陈小生的自我推荐信写得平淡无奇，甚至有点偏题。笔者看到他的自荐信中有很多段落都是在描述自己的性格特征，而不是特长、获奖以及社会服务经历等。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我个性开朗，能与同学友好相处，乐于助人，善于沟通，积极帮助班主任管理班级事务，是同学们的知心朋友，也是老师的得力助手。”**在后期访谈中他这样告诉笔者：**“我真是不知道自荐信该怎么写，感觉自己除了读书，没有其他特长，也没有什么突出的经历可写。老师说要我们自己写，我看其他很多同学都是父母帮忙写，我父母没什么文化，只有靠我自己了。这个自荐信是我用手机在课余时间随便在网上看了一些模板后自己改编的。”**从与其他同学的交流中，笔者证实了陈小生的猜测。班上另外几个来自城市家庭的学生的自主招生材料全部都是父母帮忙准备的，甚至有几个学生的自荐信都是父母写的。

陈小生的父母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整个自主招生过程中，备受煎熬的不止学生，家长也是手足无措。陈小生父亲在带儿子出发去武汉参加自主招生复试的前一天晚上打电话向老师征求意见和帮助：**“我们去大学面试时穿什么衣服比较合适？要不要带一点土特产之类的过去？”**笔者得知陈小生父亲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出省，也是第一次去大学校园。对只有初中毕业的他来说，大学是很神圣的地方，是遥不可及的，没想自己的孩子居然能被选中参加复试。这个机遇对这个家庭来说是兴奋与焦虑并存的，但是最终陈小生还是以落选告终。陈小生回来后告诉笔者：**“当了一次炮灰，只能认命了！这次自主招生考试的题目太灵活，考了四书五经、亚投行和一带一路，跟我们平常做的高考测试题完全不同，只能说是自己准备不足。真是瞎折腾了一场，费钱还费时，早知道还不如一门心思准备高考复习呢！”**

**(二) 彭欣欣：“我就是大家族里的一个棋子，考大学是为了填补家里的职务空缺！”**

彭欣欣的父母虽然都是初中毕业，母亲在家务农，父亲在城里当货车司机，但是她的父母从小就非常重视教育，即使儿女们成绩不是很好的时候，依然顶住各种压力，保证她们完成学业。**“我们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所以现在砸锅卖铁都要让孩子读大学。我们前面4个（孩子）都是女孩子，当时村里人都给我们泼冷水说反正女儿都要嫁出去，就不要让她们去读了。尤其是老大，成绩不好，当时让她去中专的时候村里很多人劝说让她出去打工算了，因为后面还有4个弟弟妹妹。但是我们还是咬着牙坚持让她读完了中专。后来她还算有出息，在广州一个旅行社做国际导游，收入也还不错。”**在第一次去彭欣欣家家访的时候，她的母亲如是说。

由于彭欣欣的父母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直接辅导子女功课的能力，所以他们把重点放在了教育期望的传递和借助大家庭的文化资本来帮助子女成功。**“爸妈经常跟我说像我们这种家庭，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只有通过读书才能走出去（进城）。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读书就只有回来种田，读出去了就可以坐办公室’，从小到大，我听得耳朵都起茧了。”**彭欣欣这样告诉笔者。教育期望的传递对城市中产家庭来说只是其中一种家长参与方式，但是对农村和外出务工家庭来说，这是他们最重要的家长参与方式，也是最隐蔽的一种家长参与方式，尤其是子女进入高中阶段之后。［26］

此外，借助大家庭的文化资本来帮助子女获得成功是另一个重要途径。**“我们自己吃了没文化的亏，没读多少书，学习方面我们也帮不上，只有让她的哥哥姐姐多帮忙。有些大事（做决策）上面我们都是请教她的大伯父。”**对彭欣欣父母来说，这里的“学习方面”不仅包括与课程直接相关的学业辅导，还包括与招生考试方面的升学辅导以及与学校生活相关的心理辅导等等。彭欣欣的父母深知自己能力有限，所以他们才更需要向大家族中有经验和能力的亲戚寻求支持以帮助其子女获得成功。其中，彭欣欣自主招生考试的成功是整个大家族文化资本的合力成果。

与陈小生家庭不一样的是，彭欣欣的家庭文化资本来源范围含括了一个大家族的核心成员。大家族中除了至亲兄弟姐妹之外，最重要的文化资本来源就是在乡镇机关当公务员的大伯父、在美国某大学任教的堂姐以及已经从一本大学毕业的堂哥。彭欣欣在决定参加国家对农村学生单独招生专项计划以后，这个消息立即在家族的微信群里（群的名称是“相亲相爱一家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主要话题均是围绕如何选择学校和专业以及如何准备申请与复试的材料。在做最后决定的前几天，彭欣欣的父母还特意赶来城里姑姑的家里召开了一个家族会议，期间通过视频通话，远在广州的姐姐们和堂哥也参与了进来。彭欣欣大伯父掌握着整个话语权，他一直坚持站在全家族的利益来考虑，要求彭欣欣报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家里已经有公务员、当导游的、当律师的、学医的，现在就差一个公安系统的了，所以为了填补家里职务空缺，你就去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吧，以后家里有点啥情况也好办事。”**彭欣欣的大伯父如是说。

这个家族会议持续了整整一下午，彭欣欣的父母站在一旁，几乎没说话。晚饭过后，彭欣欣的父母这样跟笔者说到：**“我们对选学校和报志愿这些又不懂，所以才请他伯父还有堂哥堂姐过来把关。我们常常跟她说，你的哥哥姐姐几乎都是读了大学的，你也别掉链子。读了大学才可以坐办公室，才可以跟政府打交道，不然就会吃亏。”**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至少三个信息：第一，彭欣欣的父母知道自己受教育水平有限，对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尤其是招生系统不是很了解，所以他们充分利用整个大家族的文化资本来帮助其女儿拿到大学入场券的门票，从而实现家族优势的传递。第二，彭欣欣父母对教育功用的理解就是能通过受教育进城找一个出人头地的工作，从而有能力和信心跟社会机构尤其是政府打交道并且避免吃亏（之前的经验），同时他们通过传递这个教育目标激励子女努力读书。第三，榜样教育也是彭欣欣父母参与的重要形式之一，通过树立哥哥姐姐的榜样作用，激励彭欣欣不能落后。

彭欣欣最终没有选择报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而是偷偷瞒着父母和伯父报考了自己理想的学校和专业——中山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并最终获得成功。虽然结果是欣喜的，但整个过程却并不轻松，彭欣欣也一直处于挣扎和痛苦的边缘。在这次自主招生志愿填报家庭会议后，彭欣欣非常气愤地告诉笔者：**“你没听到吗？我们家里少一个公安系统的，我不想去学这个。我想学旅游管理。他（大伯父）觉得我们家已经有一个学旅游的就不想让我学，（家里）不需要再一个人学这个，他觉得我学这个单纯是为了自己，而不能造福大家。他们叫我去学公安，即使当个小公安，然后各种调来调去，关系也特别好用，他们只希望以后办事是全家人办事，他们比较相信关系，懂吧？我就是大家族里的一个棋子，考大学是为了填补家里的职务空缺！”**此后，彭欣欣多次向笔者抱怨在这种大家族中的不自由，尤其是长辈们的横加干涉，她希望能逃离出去。

彭欣欣自主招生最终能获得成功是其大家族文化资本的集中体现。其他大多数农村家庭都很难有这种机会。虽然彭欣欣最终选择了背离长辈意愿，并在挣扎中向父权制提出了挑战，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彭欣欣的哥哥姐姐们（含堂哥堂姐）都在背后有力地支持着她。堂哥多次帮助她在网上搜集中山大学招考资讯、历年试题等，并主动联络中山大学招生办公室询问政策和意见等。远在美国的堂姐也通过远程视频对她的复试面试进行模拟训练和指导。与陈小生父母的孤立无援相比，彭欣欣父母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都占有明显的优势。综合考量其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彭欣欣家庭更接近城市中产家庭。但是在子女是否能顺利依据自己的兴趣进行学习等方面与城市中产家庭又有所差异，笔者将在下一小节中论述。

**(三) 李城睿：“我感兴趣就去做，后面的事情有我妈呢！”**

李城睿的母亲高中毕业，是一名基层公务员；父亲大学毕业，在国企工作。作为一个公务员，李城睿的母亲对政策文本的理解及实际的操作远比农村父母熟练得多。国家自主招生政策已经连续实施多年，李城睿的母亲深谙其道，并且早就开始规划。**“她小学开始学二胡，当时就花了我将近两万块钱去学，学了好久，一直持续到高中，参加了各种考级，就是希望在她考大学时能加分。吉他也学了，乒乓球、游泳都学了……现在偶尔会带她到社区参加一些义工活动。去年暑假带她去了广州长隆海上乐园旅游，以前也带她去过大学参观。”**与陈小生和彭欣欣父母临时接到自主招生通知的准备不足相比，李城睿的父母显得更加自信和谨慎。

**“前段时间我们还帮她报了一个在省会南昌的（自主招生）培训班，交了3000多块报名费。主要给她介绍大学和专业选择以及自主招生材料的准备还有复试注意事项等。这个自主招生的材料真是很复杂很复杂，虽然我们平常上班时也要处理很多这种类似迎评检查类的文案，但这个自主招生从填写申请表，然后去有关部门盖章，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跑，盖章完了要网上上传，上传后还要打印资料，来来回回我差不多弄了半个月。”在**对李城睿的母亲访谈中她这样告诉笔者。后来在与李城睿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她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自荐信都是其母亲帮忙写的，笔者曾尝试去获取这个自荐信，但是遭到了其母亲的拒绝。

在与这位城市中产阶层母亲的交流过程中，笔者发现她能够非常熟练地说出一些专业词汇，比如自主招生、定向生、自荐信等，甚至一些学科里面的知识点比如化学方程式、地球自转与公转等也都能信手拈来。此外，她还是学校家长委员会的成员，因此她经常来学校做义工，参与和组织学校的各类活动，比如参加学生成人礼、高考誓师大会、以及其他文体活动等。这些情况在笔者与其女儿李城睿的访谈中也得到了印证：**“妈妈对自主招生很了解，她知道哪些项目可以加分，所以她在我初中和高一高二时就让我参加各种竞赛。现在到了高三了，也是她帮我准备各种资料，帮我选学校等等。我得出的结论就是，自主招生不仅是学生的竞争，更是家庭的竞争。这不是说有什么潜规则，而是说一个知识水平较低的家长在这方面就很难帮助孩子，或者给予指导。”**李城睿坦言母亲对高考尤其是自主招生考试的了解远超过自己。她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奋斗，有母亲在地方，道路都会更加顺畅。

李城睿在班上是出名的才女，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她的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拿来当范文在全班诵读，她也在各类报纸杂志发表了数篇文章。李城睿网名叫“二胡悠悠”，她在其公开的社交网络中写过这样一篇题为“想”的小诗（原文太长，有删减）：

想坐在操场上继续喝着啤酒看星星。

想去空中补给（KTV）唱到喉咙沙哑。

想去唐人轩看一部从笑看到哭的电影。

想去德玛西亚喝一杯抹茶牛奶。

想去酸柠檬买面包。

想去鼓楼放孔明灯。

想去湿地公园烧烤。

想去明月山上看日出。

想找个晴天躺在自己的床上睡整个白天，让阳光透过窗户晒在我的碎花被单上。

想再去趟武汉在小吃街吃到扁桃体再次发炎。

想再去趟凤凰，站在虹桥上看夜里的灯和着清吧的民谣慢慢亮起来。

想去丽江的小屋喝一瓶风花雪月。

想去台湾来一次环岛旅行。

想去澳门塔上玩一次世界最高的蹦极。

想去斯里兰卡玩一次跳伞。

想去沙漠里找一个骆驼头骨。

想去新西兰的皇后镇卖瓷器

想去极圈里看极光。

想让立起来的墓碑有话可说。

想让故事重新书写。

在对李城睿进行家访时，她的妈妈搬出了厚厚一叠女儿的周记本对笔者说：**“我从初中开始就让她坚持写周记，我定期检查，有时候还会在她周记本上给她留言。到高中之后她就开始用网络写。”**后来笔者去李城睿的社交网络空间，发现她从高中开始几乎每周都在写周记，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高三。**“我的作文写得好，主要得益于我妈妈帮助我养成写周记的这个习惯。同时我爱阅读的习惯也是妈妈帮助我养成的。我记得以前妈妈经常从新华书店买回一些书后，我们一起阅读，然后各自分享心得体会。我对文学的喜好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养成的。反正妈妈说了只要我感兴趣就去做，后面的事情有她呢！”**李城睿非常得意地告诉笔者。最终，李城睿被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

与陈小生父亲不敢用普通话跟班主任交流，以及带孩子去学校面试时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合适相比，李城睿母亲在与学校和社会机构的互动过程中显得从容和自信得多。笔者在田野调查时发现，她不仅隔三差五地来学校与各种老师交流聊天，还经常来到教室看看女儿甚至与女儿的同学们交流。同时，李城睿母亲经常给女儿做心理辅导，尤其是在女儿心情低落的时候。“**高三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她每次心情不好时就不想上晚自习，这个时候我就会跟班主任请假，带她出去散散心，比如逛图书馆、逛公园、看电影等。写日记也是我教给她放松心情的一个方法。”**

从对家长角色的定位看，李城睿母亲一直是女儿成长道路上的领航员、兴趣爱好的发现者和求学道路上的助攻者。李城睿心情低落时，母亲会想尽办法陪她走出阴霾。母亲从小到大让李城睿尝试了不同的课外兴趣班，为的就是帮助她找到自己的特长并培养自己的爱好。在压力最大的高三阶段，李城睿母亲不惜全家陪读，以便让女儿全力备考。李城睿母亲的家长参与脚本是基于其对女儿的了解、对教育的理解和对政策文本的熟悉，具体的实践操作是其运用其文化资本的集中体现。

**结论和讨论**

“寒门难出贵子”的问题一直是教育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到阶层和城乡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27］[28][29]，但是对影响机制的解释尤其是对不同家长在自主招生过程中的比较研究甚为缺乏。本研究试图通过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利用对三个家庭的深描，呈现城乡家长参与子女自主招生过程的不同画面。在分析和解释资料过程中，本文尝试站在受访者自己的角度来解释其生存心态和日常行为背后的逻辑。

我国自主招生政策自从2003年实施以来，已有90余所高校参与其中，报名人数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不难发现，作为一种“掐尖”和选拔“偏才”“怪才”的招生方式，自主招生从一开始就注定与大多数农村学生无缘，尤其是来自普通中学和成绩中等偏下的学生。虽然国家为了解决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比例偏低的问题，从2012年开始实施了针对农村学生的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但依然存在着向知识精英阶层、城市学生倾斜的趋势。本研究发现农村学生和家长面对这些政策时，显得遥不可及和准备不足。相反，城市中产家庭的父母则很早就开始为子女的大学升学做准备。作为建构多元化高校学生选拔机制的新探索，自主招生其实已演变为家长文化资本的角力场。在这个角力场中，以家庭收入为主的经济资本是基础，文化资本是核心。不同家长依据其家庭资本，采取不同的态度和策略应对高等教育入学场域的竞争。在布迪厄看来，教育场域的博弈类似棋牌游戏，手中有多少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玩家怎么出牌，而出牌的技巧也会对最终结果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布迪厄也提出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是息息相关并且互动共生的。［30］

**本研究通过对陈小生、彭欣欣和李城睿这三个家庭案例的深入分析认为：**以陈小生为代表的农民家庭在自主招生过程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家庭收入普遍偏低，家庭文化资本的匮乏容易让家长显得准备不足并产生一种不自信。这种准备不足和不自信也来自其家庭文化资本与教育系统主流文化不匹配，进而影响到家长与社会结构比如学校的交往，导致来自农民家庭的学生错失很多机会。比如，前文提到的陈小生父亲因为不会说普通话而不敢与班主任交流，陈小生不知道该如何写自荐信而不得要领最终功败垂成。以彭欣欣为代表的外出务工家庭虽然同样来自农村，但是因为与城市中产家庭接近，加上整个大家族的集体用力，最终在自主招生中险胜。彭欣欣在父权制的大家庭中承担着巨大的家庭压力，她考大学是一种功利取向，目的是为了填补家里的职务空缺。她想要顺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和成长是其不断挣扎和与背离家庭长辈意愿的结果。以李城睿为代表的城市中产家庭则明显不同，他们不仅不用为日常生计发愁，也深谙教育系统的规则，与社会机构以及学校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父母不仅在学业上和心理上可以给予子女直接辅导，在备考中可以未雨绸缪、早做规划，还可以在不断自我学习的基础上了解子女特性，挖掘其兴趣爱好，让子女有计划地自由成长。

本研究的另一个发现是，**家长参与子女升学过程中的脚本是基于其对子女的了解、对教育的理解和对政策文本的熟悉，具体的实践操作是其运用其文化资本的集中体现。**不同家长的父母参与脚本和实践策略与其在社会空间中所处的位置相关。农村和社会底层家庭倾向于采取自由成长模式，而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倾向于采取协作培养模式。［31］通过对三个家庭的深入观察发现，农村家庭的父母参与承担着阶层差异和城乡差异的交叉性多重剥夺，其中外出务工家庭尤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影响，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整体低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也没有城市家庭的稳固和全面，农村居民的风险系数高于城市居民导致农村居民大量离家外出打工，剥夺了他们与子女面对面互动的机会，同时他们主要从事脏乱差的体力劳动，工时较长，很难抽出时间来跟子女交流。第二，农村居民在城镇化、工业化以及以网络电视为媒介的快餐文化的夹缝中生存，他们户口在农村，但通过手机电视等各种媒介深受城市价值观的影响。笔者在田野调查时发现陈小生的父母在供陈小生读书的同时，还要想着给大儿子存钱在城里买房。“现在农村娃儿娶媳妇首先就是要在城里买套房，不然媒人连门都不会进。”陈小生母亲如是说。第三，在城乡分野的同时，教育系统在贤能主义的掩护下起到了将区隔合法化的作用。在访谈中，几乎所有的父母都认同高考的公允，很少质疑其公平性，只是城市中产家庭在熟悉了教育和考试规则之后提前做好了各种功课。尤其是在高中阶段，主流教育系统的符号暴力把家庭教育碾压至为子女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边际角色。

另外，本研究还发现，**自主招生考试制度本身与家长参与的模式有其内在关联，并最终对学生的考学结果产生影响。自主招生的选拔形式都比较灵活，侧重对学生综合素养的考查，考试范围往往也不局限于课本的死知识。农村和社会底层家庭的自由成长式家长参与模式偏向于以课本知识为主的应试教育，在较为灵活的自主招生考试中处于不利地位。**比如，陈小生认为自主招生考试题目太灵活，跟他们平常做的高考模拟题完全不同，加上自荐信的写作不得要领最终功败垂成。相反，采取协作培养模式的城市中产家庭则早有准备，并且对子女能力的培养更为系统和全面，因而在自主招生考试中显得从容自如。

本研究尝试从家长参与这一内部机制来分析城乡学生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原因。通过文化资本理论和家长参与理论两条轴线来分析城乡家长参与子女大学自主招生的异同及其背后的逻辑。需要强调的是，在转型时期的社会大背景下城乡和阶层的交叉影响甚是复杂，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内部的异质性也较大［32］，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在进行改革的时候，需要综合考虑城乡学生和家庭的各种差异。在政策制定后需要通过便捷的方式让不同阶层的家庭都能知晓，在实施过程中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学校层面也需要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处境，加上有些制度性障碍和文化性藩篱横亘在家长和学校之间，因此教师在与家长和学生的互动过程中也要酌情考量，尤其是要给予处境不利家庭的孩子更多关照和帮助。

参考文献：





